



地台寺原本叫地坛

余斌

昆明有没有地坛？有。这，我是读西南联大史料才知道的。昆明本地人说的地台寺，西南联大人，主要是教授，他们称地坛。

开初我未怎么在意，觉得许多来自北平(京)天津的作家、教授，他们普遍感觉昆明太像北平了。甚至说得很具体，如老舍说“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”(《滇行短记》)，冰心说“近日楼一带就很前门”(《摆龙门阵——从昆明到重庆》)。他们甚至依自己的语言习惯说昆明的地名，比方说金碧鸡坊，他们要叫“金碧牌楼”(民国时期《吴宓日记》)，正义路、光华街口的三牌坊，他们要叫“三牌楼”(同上)。因有这种印象，所以在读民国时期《吴宓日记》时，见该书多次提到“地坛”，就以为可能是联大教授的北平用语习惯，故仍未在意，更未因“地坛”而与“地台寺”发生联想。直到在前两年出版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里又多次见到“地坛”，我才感到这个“地坛”应该留意：从地理位置看，无论是《吴宓日记》还是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，里面说的“地坛”，应该就是今人说的“地台寺”，但他们为什么都不叫地台寺，这就有点奇了。

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民国时期《吴宓日记》十本，与西南联大(昆明、蒙自)有关的三四本，我都读了，多次提到“地坛”。例如：“王曼明赴地坛图书馆办公”。王曼明是外文系女生，在联大图书馆打工。地坛图书馆即西南联大图书馆。女生宿舍在文林街“昆中南院”(今五华区第一幼儿园)。从文林街“昆中南院”到“地坛”，说“赴”也可以。(午饭后)“预行警报，偕至城北苏家堂[塘]坐避。”(下午返，途中)“至地坛中日史料会观书”。此句“地坛”是地名，“中日史料会”设在“地坛”，联大教师查阅专题史料很方便。

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)迁昆明，办事处驻花巷(位于前些年尚存的人民电影院东北方)。《吴宓日记》中以“棉花巷图书馆”指代北平图书馆，与用“地坛图书馆”指代联大图书馆相同。

2018年，中华书局出版《郑天挺西

南联大日记》精装两厚册。郑天挺教授是西南联大总务长，其日记内容丰富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，学术价值极高。其中带有“地坛”的文字记录亦多。例如：《跑警报出城门》(循地坛石路北行，遇xx，xx，同至红[虹]山山峡，席地而坐)。(警报结束回城)“行至苏家潭[塘]，大雨，避于树下，稍停，乃至地坛。”“至地坛史学系。”西南联大史学系与“中日史料会”都设在“地坛”。

这里，“地坛”纯粹作地名使用。从吴宓、郑天挺两位联大教授的日记资料看，从“地坛”与苏家塘、虹山的地理位置关系看，两教授所记的“地坛”，可以肯定就是今天大家说的地台寺。问题是，昆明的地台寺，难道本地竟无人知道原本叫地坛？查史料很费事。好在我终于在《昆明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2辑里见到了“地坛”，书是1994年2月出的。这是一本医疗卫生方面的专辑，原本不太在意，随便翻翻，见有一篇《昆明红十字会创始人刘锦堂》(作者陈天民)。我前年在省红会医院做过手术，就看了。文章讲到民国时期北门街发生火药库爆炸，伤亡惨重，红十字会“劝捐购买”数十亩地，那块地就在“大西门外地坛”，并加括号注明“大西门外地坛”即“现在昆明工学院附近”。而所谓“现在”，当指这本文史资料的出版时间1994年2月以前，其时昆明工学院尚未改名昆明理工大学(昆明工学院改名是1995年)。

北门火药库爆炸惨案发生于1929年。这表明，当时(1929年)民众仍在使用“地坛”之名。更要紧的是，作者把“昆明工学院”和“地坛”两个名词连在一起说事，表明在昆工改名的1995年之前，还有人记得“地坛”。

但一篇文章毕竟是孤证，不够硬。我希望在政府相关部门编的地方志类书籍里找到更有力的证据。不巧适逢疫期，查找图书困难重重。只好向云南师大图书馆杨雨涵女士求助，请她在昆明文物、地名类图书里找寻线索，关键词：昆明/地坛/地台寺。

没几天信息传过来了，杨女士称查阅了《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地名

志》《云南省昆明市地名志》二书，书中都附有一张名为《昆明县界域图》的老地图，杨女士说图上在大西门外不远处标注有“地圪”二字。

这张昆明市的老地图可是难得一见，尤其是图上在大西门外不远处标注有“地圪”二字，让我看到了曙光。稍过些天，请师大龙美光先生将杨女士给的相关复印资料从呈贡(师大)带过来了。用放大镜看昆明老地图，果然在“大西门外不远处”看到了“地圪”二字，那个“大西门外不远处”正是人们平常说的“地台寺”的位置！

这张老地图太重要了。仔细搜索，信息量极为丰富。老地图不但在大西门外标有“地圪”之名，而且在正东盘龙江外标有“先农圪”之名。

查了查书，知那个“圪”字原本是“臺”的俗字，音义同“台”，民国时期昆明老地图的绘制者却误将“圪”字当“壇”(坛)字用了，老地图上的“先农圪”即“先农壇(坛)”，“地圪”即“地壇(坛)”。

后来查《盘龙区地名志》，知道先农坛旧址在明通巷省电信局仓库。

既然先农坛可以认定，从逻辑上讲，地坛也可以认定，但具体地理位置还悬着。

紧接着，以收藏西南联大文物闻名的龙美光先生，又用电子邮件传给我关于地坛的三件原始史料，其中最重要的是1947年6月22日昆明《中央日报》的一篇报道的版面图片，竖排标题(繁体字)为：“建廳今在地壇 舉行植樹典禮 並請盧主席親臨訓話”。建厅即云南省建设厅，植树典礼由该厅主持。正文字小，有的字迹模糊难辨，但关键的文字“今日為夏至節，下午二時，將假西郊地壇舉行植樹典禮”仍可辨认。

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的两则启事也很重要。启事内容此略，要紧的是该征集会留下的地址：“本會會址·昆明大西門外地壇”。

材料够了。铁板钉钉。关于地坛的具体位置，已知的文字材料还停在方位描述上。但毕竟一步一步靠近了。除昆明老地图、西南联大教授日

记等提供的线索外，最后又读到一篇题为《战火中的抗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》的回忆性文章，是从“百度”查到忙请龙美光先生下载传我的。作者戚志芬当年就在地坛的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工作，她在专题回忆录中说：“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合大学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集委员会，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，地址在昆明大西门外地坛。”又说：“当时史料会设在西南联大后门外的地坛，历史系和史料会同在一院，遥遥相对。地坛地处偏僻，四周都是荒丘野坟，旁边只有一条羊肠古道。”当年就在地坛小院上班的人回忆地坛，其准确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。明确指出地坛位于“西南联大后门外”已经相当可以了，极为难得。但联大后门(今云南师大原校本部西门)外的那条“羊肠古道”被铁路隔断，地坛旧址是在铁路的北侧还是南侧？

这下轮到笔者了。我早就知道师院旁边有个火葬场。1952年我在昆一中读初三，有个星期天就去看(当时尚不知道地坛、地台寺之名)。从昆一中到西站，顺环城北路走过去，左转一条小路。这是一条古驿道(即戚志芬说的“羊肠古道”)，路右是师院，路左是菜地(今云南师大西院)。前行过铁路，朝左前方走四十米来即到火葬场。见一院子，坐北朝南的门开着，走进一看，有几排很普通的平房，样子颇旧，也不见人管。显眼的是院子中间置放着一个大汽油桶，无盖，里面有未及清理的炭屑及灰烬，桶外地上也残留着一些。看样子这就是火化炉了。所谓火葬场，大致如此。

如今随着接触史料的多增，感觉告诉我，六十多年前看到的那火葬场，应该就是地坛的遗址。

近期笔者几次去“地台寺”师大教工宿舍察看。据笔者六七十年前的印象推测，地坛遗址的位置大约是7栋/8栋那里。

地名是历史，是文化，是记忆。不尊重地名，没必要的改名，或以讹传讹，等同于修改历史文化记忆，忘记历史文化记忆。

木棉飞絮

樊本华

漂洗过的天空明净而耀眼，高原曼陀罗的淡蓝底色打着鱼鳞状的补丁，白得像隆冬飘过的雪花。风是性急的少年，举着火把追赶慵懒的云朵和高傲的木棉树。云朵娇羞的乘风溜走，木棉像肌腱结实的巨人稳如磐石地伫立在田间地角，默默地守候着一片葱郁的菜园，鹧鸪在枝头欢腾嬉闹，叫声像一把尖利的刀划破云霄，穿过田野，穿过村庄，在龙川江畔隐散而去。

木棉树是这块土地的英雄树。高大，挺拔，伟岸，壮实。冬末春初，一树树红花艳如云霞，红胜烈火，它为渡江的红军战士点燃了灯笼，它为满腔的祝福献给了浴血奋战的英雄儿女。侧耳倾听，红军战士吹响了号角。一层楼在一层上的绿叶拼命吸收阳光雨露，把孕育已久的生命毫不保留地迸发出来。

沿河种的稻田寥寥无几，被大片大片的葡萄园和芒果地取而代之。一股咸涩的燥热不经意间溜进了巷道，混合着葡萄酒的果香在龙川江畔游荡，龙川江突然变得优雅贤淑起来，不再大大咧咧地奔跑。庚子年的春天，所有的花开都失去了意义，我宅在家里，不知道报春花是不是改变了颜色，不知道木棉花几时结籽，不知道稻田里的秧苗是几时返青的。春天被谁拂走了？我没有心绪抬一根竹竿去母亲的菜地边把那树血红的木棉花打下来，撕去萼片和雌蕊，亲手做一盘原汁原味的凤爪菜给家人品尝。不出家门，以一摞文学著作来医治自己的愚钝，以一卷《心经》来安抚浮躁的灵魂。无聊至极时，也像孩子一样刷快手抖音，打发光阴。

时间慢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审视生命，认识卑微，反思傲慢，学习低调，修炼虚心和冷静，把一颗燥热的心冷却下来。

延迟开学整整两个月，时间停止。我蜗居的小城凤凰花开得娇艳欲滴，一树树烈焰焚烧了突如其来的病毒。学生在家里自学近一个月，不知效果如何？我们开始走村入户，送教上门。穿过一片葱绿的稻田，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木棉树鹤立鸡群般伫立在田埂上，它们抽了新枝长了嫩叶，那些有幸逃过猎人镰刀竹竿的木棉花，挺着饱胀的肚子，成了胸怀白絮的老鸱苞。它们吸收了热带季风的养料，渐渐成熟，一颗焦躁不安的心在蠢蠢欲动，趁着午后撩人的阳光探头探脑，一个个嬉皮笑脸地吐出洁白的絮儿，带着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籽儿，风越刮越大，絮儿越来越多。

“飞絮了，木棉飞絮了。”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。木棉在飞絮，稻秧在分蘖，芒果在泛黄，葡萄在滋滋滋滋地吸收阳光。我的头顶有一把火炬在燃烧，一段苦乐记忆鲜活在眼前，不能抹去。

那是二十三年前的冬月，我和爱人在为结婚的事奔忙，在买床上用品

时，母亲说，结婚是一个人的神圣大事，绝对不可以潦草敷衍，一定要谨慎行事，需要添置什么物品就自己买，但是枕头得她亲手做。母亲先到农贸市场买了六斤老母鸡(木棉絮)，又到缝纫店扯三尺六寸的红布，母亲对人生的大事充满了敬畏心和仪式感，什么都要带个“六”，甚至付钱时也要带个“六”，她喜欢这个数字，“六六大顺，有福有禄”，似乎和六搭上了联系，所有的事情就顺心遂意了。她用红布做两个长方形的大布袋和两个小布袋，大布袋里填满了柔软、洁净的老母鸡，小布袋里装上红枣、花生、桂圆、南瓜籽和葵花籽后封口放在大布袋里，做好了枕头芯，再套上买回来的绣花枕套，一对装满母亲祝福的新婚枕头就做好了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母亲装的小袋子叫“五仁袋”，这是老家的习俗，也是老人对儿女的期望和祝福，寓意早生贵子，永结同心。尽管母亲如此用心，可是我们还是不争气，或许说我们已这让母亲失望之极，她在去世前都没有看到我们的孩子降生，婚后的九年里，妻子经历了多次流产和一次失去女儿的悲痛。婚后十年，当我们都快被生儿育女的事情累趴时，老天才赏赐我们女儿，可是母亲留下深深的遗憾匆匆地走了。

记得在婚后的第三年，我们就把婚床和所有床上用品都换了，想通过这种方式驱除所有的霉运和晦气。不过，母亲做的枕头我们一直珍藏着，在时光里长成了一种念想。

放置的时间长了，木棉枕头会吸收空气里的水分，变得板结、僵硬。每年冬天，妻子都要翻出来晾晒。那时，我搬一条椅子在冬阳下闭着眼睛打盹，也晒晒灵魂，舒展舒展疲惫的筋骨，阳光如同母亲的胸怀，厚实而温暖，我感觉到她那粗犷的大手在我脸上不停地抚摸，我凝神屏息，嗅到了母亲沾满泥土和汗水的味道。木棉飞絮了，木棉飞絮了！絮花如同母亲的白发在我心头飘起了雪，外表热烈，内心冰冷，再多的开心事都无法在我平静的湖面上激起柔软的波紋。有母亲在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可以撒娇，可以装傻。然而，这些奢侈的礼物在二十年前就彻底底地丢失了。

我没有了给母亲尽孝的机会，我无法做一个撒娇的孩子。有了孩子，可是她没有奶奶和爷爷的溺爱，女儿渐渐长大，我却无法向她叙说奶奶和爷爷的故事，只知道她的人生又留下了遗憾。

木棉飘絮，纷纷扬扬，铺天盖地席卷我苍凉的内心。人生飘雪，空空茫茫，诸多忏悔，郁结荒芜的心间。木棉飘絮，在我心头下了一场绵延的雪。人生中，不知有多少个如此静美的时刻，可惜，一切尽在回忆中。

弥勒山水叙事

黄光平

天空岁月无边，大地呼吸绵长。在迢迢的历史长河中，水是山之魂，山是水之骨，山水，自古以来被视为万物产生之地。弥勒“川原壮阔，山水雄奇，北距圭岭，南阻巴盘，东有曲部之险，西有阿坎之雄。蛇花口、革泥关两峡洞，壁削插天，真天险也。”清乾隆《弥勒州志·疆域卷》如此寥寥数语，弥勒全境的山水便呈现在眼前。

在茫茫大地上，一粒土的弥勒，山以拖峨闻名于世。清乾隆时代的弥勒记叙中，就有“山如陀峨，曲部，水则息宰，巴盘，结为名胜，荡日月而摩云霞。”从字面上追溯，那时的陀峨山，已演变成当今的拖峨山；曲部山亦称部山，耸立于城东。巴盘，是巴甸河、南盘江的统称，而息宰河、巴甸河，则为甸溪河古老的乳名。

拖峨山海拔2137米，之所以比弥勒境内最高峰、海拔2315米的金顶山有名，大凡缘于清乾隆《弥勒州志》白纸黑字的镌刻：“城东十五里，延袤一百八十里，可卜阴晴。”亦缘于位列弥勒八景之一的“峨岭横云”。弥勒民间有谚语：“有雨山戴帽，无雨云系腰，”拖峨山知冷暖成了弥勒地区的晴雨表。明崇祯年间总督蓟辽的儒将杨绳武在其《古风·拖峨山》中，把拖峨山誉为西南第一山，诗云：“奇冠冠壮岳，西南第一山。”弥勒名士、清康熙戊戌科(1718年)进士李尧畴在《七绝·峨峰倒影》中写道：“但说弥勒称一胜，疑真疑幻总徒然。”

甸溪河，古称八甸河、巴甸河，下游称息宰河，由花口河、禹门河、白马河三水归一，在弥勒城东附近汇合而成，由北向南蜿蜒流淌于市境中部，最后汇入南盘江，是弥勒境内径流面积最大的河流。说拖峨山是弥勒人的“父亲山”，甸溪河是弥勒人的“母亲河”，更多的是文化的赋予，峨山甸水，一年又一年泽被着弥勒大地，一代又一代养育着弥勒人。拖峨山与甸溪河，构成了弥勒的山水骨架，也勾勒出了弥勒的文化经纬线。

在浩瀚彩空间，一滴水的弥勒，水以甸溪灵秀一方。人类逐水而居，城

沿水而建，甸溪河特有的执着与柔韧，孕育了弥勒文明，承载了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根脉。

有古书记载：“弥勒水隍洞峡，高下殊殊”，说的是这片土地历来干旱缺水、旱涝悬殊。这与弥勒地势北高南低，东西两山呈南北向逶迤耸峙，中部呈丘陵、缓坡、平坝有关。事实上，弥勒大地上溪流交错，龙潭遍布，堰塘纷呈，沿市境西进南环东出的南盘江，蔚成弥勒大地上的清流轻浅，激越澎湃。从地下冒出来的泉水，散漫成这片土地的掌纹。掌纹里有时间，也有情感记忆；有遐想，也有俗世生活；有安宁，也有势利溪流。随山势蜿蜒、起伏，明珠泻玉的溪涧，像一把历久弥新、相思相知的竖琴，在弥勒大地风生水起，弦歌长盈。

千山拱卫显峻拔，百水流长泽福地。以金顶为高、拖峨为奇的弥勒之山，领“泉流山半，俯瞰郡治”的锦屏山为序，徐徐展开巍巍西山(古称阿欲部山)绵延百里的民族文化奇葩，咸和山“濒临几度旷人心”的万千气象，翠屏山“天然屏一座，翠立障边陲”的苍郁伊人慕，螺峰山“一点青螺出翠涛，砚涵影映挥毫”的风姿意气，展浩山“倍出人杰雄天下”的钟灵毓秀，花山“山花红紫树高低”的春色如锦，甸溪河源远，南盘江流长的弥勒之水，引“飞瀑下晴川”的禹门河为开篇，就像萦绕大地的藤蔓，缠结多情，一路滋润恬静的田园、村庄，在流动中唤醒草青草长，花开果香，弥勒大地一年一次的花果。

水长流，山川秀。弥勒灵性的山水，是一本自古娓娓叙事的大书，于沉静与激动中散发出悠远的气息，长一山葱翠的树木，引一山百鸟的歌唱，让葳蕤苍青的每一座山岭、每一片土地茁青溢翠。土地厚德载物，流水利万物而不争。山的“美德”，水的“上善”，是人的榜样，是真正的万世之师。自古“号金城焉”的弥勒，山是福山，水亦福水，文运山水，丽景天成。



杨木华

遇见苍山绿绒蒿之王

当站在苍山西坡那几株高大壮实的威氏绿绒蒿旁，请妻予定格下我虔诚仰望的瞬间时，我知道，这些王者气度的红色绿绒蒿，是我所见过的绿绒蒿之王，无愧于它名字中的威字！

对威氏绿绒蒿的追寻，源于多年前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。那是苍山西坡李家庄的一位朋友发给我的。一见那红色的奇特花，心，立马动了。可一打听，说只是曾经有过，如今是否存在并不确定，四处问询后，确定马鹿塘也有这花。于是，那个周末我在金刚崖下阔叶林中找到了这绿绒蒿，可惜花开未盛且植株少，一种担忧开始萦绕：这花，是否已成濒危植物。

后来，我从苍山西坡登三阳峰，在海拔3600米的地方竟然撞见这绿绒蒿——马鹿塘生长点的海拔3000米不到。当那绒毛密布的叶片软软地侵入心间时，我突然想起三月在鹤云峰西侧遇见的那一山绿绒蒿。

是的，是一山，那是三月看古杜杜鹃的意外收获。在杜鹃林下，几株威氏绿绒蒿幼苗突然闯入视野。靠近，蹲下，轻轻抚摸那毛茸茸的叶片，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在心中缓缓升腾。与草木相亲，是最真挚的相连，也是最轻松的相连，无需心机，不用设防，彼此敞开胸怀坦然相见，更何况是大名鼎鼎的绿绒蒿。在山谷中一个小瀑布旁，看到几株高挑的绿绒蒿正疯长。我对妻子说：花开时

节再来一次，那时鲜花盛开流水丰盈，一定浪漫非凡……

那天才知道，苍山西坡的李家庄后山有大片绿绒蒿并不是传说！

那年我在马鹿塘探访绿绒蒿之后，一个远方的导游，刻意带了日本的两位老者要探访这花。导游通过仅有的微信公众号联系我，他说据记载李家庄后山有。可那年的我，还不知道李家庄后山这花的具体情况，于是推荐他们去莲花峰西坡看这花，还特意叮嘱当地的带路人，说不准他们采挖。去年一家报纸上刊出某地首次发现，几株花被说得惊天动地，可他们却不知道，这花在苍山西坡实在寻常——其实，它们都困于一隅，很多判断仅仅基于自己的视野，我也犯过这样的毛病。其实，也不止是我，威氏绿绒蒿最初被叫作尼泊尔绿绒蒿，后来发现它与蓝色花的尼泊尔绿绒蒿有很多不同，于是才定为新种取了新名。

今年雨季却迟迟不来。那片绿绒蒿，一直在脑海中摇啊摇，于是六月中旬我再次前往李家庄后山探访。还未到花苗众多的草坡，山谷中的几株绿绒蒿，早已把我彻底征服！

是的，是征服！我以前遇见的绿绒蒿，虽然用了高大威武这一类词来形容，可实际上是夸张。今天遇见的，才不辜负那类词语的本意！我在那几株绿绒蒿旁一站，伸开手臂还够不到顶部的

花！那大朵大朵的单瓣红花，顶部的先放，然后一朵一朵渐次向下开。花边开边谢，花一谢，种球开始膨胀，粟粟科植物的特点立马凸显。若单看花，还以为普通的鸡冠花。杜鹃林边的这几株，约2.5米高，是我见过的最高大威猛的绿绒蒿了。

抵达草坡一看，一山的绿绒蒿并非全部拔节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开花。拔节开花，是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拼尽全力的终极追求：开花，结果，散种，然后枯萎死亡，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。蕴蓄两三年，等来花开，等来生命最烂漫的时刻。可惜我来早了，绿绒蒿底层还是密密麻麻的花苞。我拍了一株又一株，拍完一朵又一朵，每一次按下快门的瞬间，都被一种幸福深深陶醉……

一朵笑咪咪的花。那是开在最顶上的一朵花，鲜红的花瓣妙曼张开，以丝绸般的质感绽成透明的笑脸，加上重重堆叠的金色花蕊，合成一个完美的笑脸，对着我这个苍山的超级粉丝笑啊笑。

这是一株全开的花，且是我遇见的唯一全开的一株。从顶部，所有的花全开了，没有一朵懈怠，全都神采奕奕看着我。若不是幸福快乐，谁喜欢把最美的笑容全部绽开！

一株招蜂的花。蝶不见，那种体型硕大的熊蜂却不少，在我按下快门的瞬间，灵性的它们往往逃之夭夭。不甘

